

民主
转型

斯蒂芬·列文斯基
卢坎·A·韦
言晓义译

史蒂文·列维茨基 (Steven Levitsky) 是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卢坎·A·韦 (Lucan A. Way) 为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

译者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3期
2024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民主的惊人 韧性

编按：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在当今世界处于衰退之中。斯蒂芬·列文斯基（Steven Levitsky）和卢坎·A·韦（Lucan A. Way）教授则试图证明这一判断缺乏足够实据。他们认为民主在 21 世纪开始以来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这种韧性要归因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以及新独裁政权或独裁领导人巩固独裁体制所面临的困难。此文 2023 年 10 月首先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4, Number 4, October 2023, pp. 5-20, <https://muse.jhu.edu/article/907684>）。

民主在 21 世纪显示出惊人的韧性。20 世纪末那场不同凡响的全球民主扩张已经结束，包括匈牙利、印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和委内瑞拉在内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民主国家都经历了倒退或崩溃。但是，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国家（即在 1975 年到 2000 年间成为民主国家的政权）抗住了风吹浪打。¹ 尽管国际环境日益严峻，但对发生“民主逆潮”或全球性“威权复兴”的担心，尚无实据。时至今日，过去的这四分之一世纪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为民主的时期。

曾经为第三波推波助澜的国际条件消失了，但民主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幸存了下来。1970 年代中期从南欧开始，民主横扫 1980 年代的南美洲，并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年达到高潮。这波浪潮令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几乎增加了两倍【根据“民主多样性”（V-Dem）项目的数据，全球民主国家从 1975 年的 36 个增加到 2005 年的 95 个】。这场前所未有的民主扩张植根于一个异常有利的国际环境。² 从冷战后期，即大约从柏林墙倒塌（1989 年）到美国领导的伊拉克入侵（2003 年），这段时间里民主得到的支持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苏联的崩溃使一党独裁作为一种政权模式丧失了信誉，从而对一党独裁政权的主要的外部支持瓦解了。它还颠覆了反共独

裁政权的存在理由。

共产主义的崩溃导致了一个短暂但影响深远的西方自由主义霸权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和欧洲联盟成为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强国。西方作为经济援助提供者的实际垄断地位，为周边国家接纳西方制度创造了强大的动力，特别是在多党选举上。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前所未有地热心促进民主。冷战的结束，消除了外交政策中一个重大的、争夺优先地位的当务之急，为更一以贯之、有力地推进民主铺平了道路。因此，欧盟采用严格的成员资格条件来鼓励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化，而美国则运用经济、外交手段，偶尔还有军事压力来阻止政变，鼓励独裁者交出权力或举行竞争性选举。

这些地缘政治变化的后果影响深远。由于失去外部支持和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无论是原本依靠苏联支持的独裁政权，还是反共的独裁政权，均在1990年代初陷入了危机。从非洲、前苏联到亚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区，孤立、破产的独裁者要么举行了竞争性选举，要么倒台，催生了数十个新的多党制政权。非洲的法定一党制政权数量从1989年的29个下降到1994年的零。³并非所有这些新的多党制政权都是完全民主的，但其中许多具有相当的竞争性。因此，到了1990年代中期，民主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唯一游戏”。

第三波浪潮的浩大声势指向了一个被低估的事实，即在后冷战时代，民主制度的表现实在是过于亮眼。⁴经过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人们已经识别出一系列有助于民主化和民主存续的结构性条件，包括资本主义发展、庞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强大的公民社会、社会不平等的下降、有效

的国家机构和经济增长。1990年代，阿尔巴尼亚、贝宁、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加纳、洪都拉斯、马达加斯加、马里、蒙古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出现了民主，但这些国家几乎不具备或根本没有这些条件。人们通常将这些令人惊讶的民主化，视为对既定的、强调结构因素的理论的挑战，甚至是对这种理论的否定，但更合理的解释是，国际条件给民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以至于因此削弱了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西方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

1990年代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会经久不衰。⁵ 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再次作为一个强势的非自由大国的兴起，这一切重塑了全球格局，终结了西方的自由主义霸权地位。随着权力平衡的转移，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影响力减弱。独裁政权越来越多地可以寻求来自北京、莫斯科以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新兴地区大国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与此同时，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出口价格的历史性飙升，使许多独裁政权得以建立（如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巩固（如阿塞拜疆、俄罗斯）或重新站稳脚跟（如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加蓬）。外部支持和丰厚的资源相结合，为独裁者扩展了活动空间，减少了他们对自由西方的依赖。到了2010年代，民主不再是镇上唯一可玩的游戏。

与此同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挫败，以及非自由势力（illiberal forces）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内部的崛起，削弱了西方大国的威望和自信。他们向海外推进民主的意愿和能力也随之下降。欧盟曾在1970年代对南欧、1990年代对中欧极具影响力，但在2010年代对抗匈牙利、塞尔维亚和其他地区的新兴威权主义时却罕有作为。⁶ 同样，

虽然美国政府在 20 世纪末成功地干预阻止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巴拉圭等国威权势力的篡权，但在 21 世纪的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

到了 2010 年代，威权主义的外部成本已经明显下降。即使是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周边国家政府，如萨尔瓦多、匈牙利和尼加拉瓜，也发现他们可以攻击民主制度而不受惩罚。

对于许多第三波民主国家来说，它们还面临另一个同样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在“棘手地区”执政所固有的难处。⁷ 新兴民主国家通常更不堪一击，容易崩溃，特别是在国力薄弱、经济动荡、不平等现象根深蒂固、贫困和犯罪暴力肆虐的国家，危机尤其容易发生。在 21 世纪初，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遇到了几乎所有这些条件。毫不奇怪的是，这些民主国家中的当选政府治理不善。糟糕的经济表现、腐败、犯罪率上升、社会政策不完善或无效，引发了广泛的公众不满。在没有强大的制度或民主治理历史的新兴民主国家中，这种不满会是致命的。

因此，有充分理由预期在 21 世纪初，许多第三波民主国家会以失败告终。民主曾经在许多棘手的地区兴起，而曾经促进了这些地区民主化的独特而有利的国际条件已不复存在。

确实，许多在极其不利条件下诞生的民主国家都经历了倒退（如贝宁、玻利维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或者彻底崩溃（如马里、尼加拉瓜）。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深陷严重的经济不稳定、不平等、腐败或犯罪暴力，经历了公众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选举产生了威胁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或威

权主义领导人。其中有些民主国家（厄瓜多尔、菲律宾、斯里兰卡、突尼斯和土耳其）出现了倒退，还有几个国家（泰国、委内瑞拉）则是彻底崩溃。

这些新兴的危机给民主的观察家们带来戏剧性的情绪波动。学者们抛出了“民主衰退”论，全球“威权主义复兴”论，⁸甚至“第三波专制化浪潮”论。⁹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22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全球威权统治的扩张”。“民主多样性”（V-Dem）项目在其2023年度的报告中声称，全球民主水平已经下降到1986年时的状态，因此，过去历时35年的全球民主进步已经“被抹去”了。¹⁰

然而，数据并不支持这样的说法。在“自由之家”的涵盖2013年情况的报告中，名列“自由国度”的有90个国家。十年后，这一数字降至为84个。根据“民主多样性”（V-Dem）的数据，世界上自由和民主选举的国家数量从2016年的96个减少到2022年的90个。这两个指标都表明，当今的民主国家数量与21世纪之初旗鼓相当——并且比1995年第三波民主浪潮的高峰期还是多了不少。这种轻微的民主滑坡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民主国家的数量从27个锐减超过三分之一，降至17个。¹¹其他指标，如政体（Polity）数据库和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语词指数（the Lexical Index of Electoral Democracy）中，几乎找不到民主衰退的证据。最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安德鲁·里图（Andrew Little）和安妮·孟（Anne Meng）开发的一个基于客观标准的民主指数，其参照内容包括当权者的更迭、选举中在任政府所获选票和席位份额，以及由记者保护委员会（CPJ）编制的、记者遭受打压的数据，他们发现“几乎没有倒退的证据”。¹²尽管里图和孟编制的指数较为粗糙，并未捕捉到形形色色的专制滥权，但他们的分析突显了一个重要事实：当权者更迭率

“自 1990 年代末以来基本保持稳定”。¹³

因此，即使正如“自由之家”和“民主多样性”所识别的那样，过去十年来当权者滥权现象增加了，那么这种滥权的后果也显然是温和的，因为许多倾向于专制的当权者并未能巩固自己的权力。自 1990 年以来，阿尔巴尼亚、贝宁、玻利维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加纳、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马拉维、墨西哥、摩尔多瓦、蒙古、巴拿马、秘鲁、罗马尼亚、乌克兰和赞比亚等国家的政权无不经历过三到六次的选举更迭。这些政权中有些并不是完全民主的，但选举的竞争性和更迭的规律性表明它们也不是“专制化”的。

感知与现实

如果主要指数所显示的仅是全球民主受到温和的侵蚀，那么该如何解释普遍存在的急剧衰退感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非自由主义或专制主义领导人在选举中的胜出，经常被混淆为民主的倒退。选举产生具有专制倾向的总统或总理确实增加了民主倒退的风险，但这不应被视为倒退的证据。民主资质成疑的当选者仍可以民主执政。例如，巴拿马的埃内斯托·佩雷斯·巴拉达雷斯（Ernesto Pérez Balladares）在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被推翻仅五年后，便与诺列加的革命民主党一同当选；秘鲁的奥兰塔·乌马拉（Ollanta Humala）曾是个未遂政变的领导人，他跟雨果·查韦斯（Hugo Chávez）如出一辙，以激进的民粹主义者形象开启政治生涯；亿万富翁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在 2017 年至 2021 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理，而意大利的乔尔吉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她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源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自 2022 年执政至今。还有些情况下，领导人试图削弱或颠覆民主制度，但被挫败了，因此在下台时民主仍然保持完整。例如，哥伦比亚的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巴西的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大概还包括墨西哥的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es Manuel López Obrador）。

全球民主倒退感与现实不符的第二个原因是，民主倒退的情况通常是短暂的。21 世纪有许多颠覆了民主制度的民选独裁者不出十年便失势，最终导致的往往是“倒退”回民主制度。例如，摩尔多瓦在 2000 年代共产党上台后出现了民主倒退，但在 2009 年共产党败选之后便恢复了民主。在乌克兰，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领导下出现的民主倒退局面，在 2014 年欧洲广场起义后得以扭转。在斯里兰卡，随着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在 2015 年总统选举中落败，滑向专制独裁的趋势得到了遏制。随后在 2022 年，民众抗议推翻了拉贾帕克萨家族，遏止了又一次民主的滑坡。在北马其顿，总理尼古拉·格鲁埃夫斯基（Nikola Gruevski）领导下出现的倒退，在公众抗议迫使他辞职后就停止了。在厄瓜多尔，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总统治下出现的倒退，在他 2017 年离任后得以逆转。同样，赞比亚在埃德加·伦古（Edgar Lungu）总统于 2021 年选举中被击败后、洪都拉斯在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总统在 2022 年下台后，民主的倒退也都得以逆转。

“专制化”总体水平其实没有人们感知的那么高，其第三个原因是，一些国家民主倒退的事件，被另一些国家的民主进步所抵消。在过去 15 年里，亚美尼亚、哥伦比亚、冈比亚、利比里亚、马来西亚、摩尔多瓦、尼泊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斯里兰卡都纷纷取得了民主进步，但这些案例受到

的关注——无论来自媒体还是学者——都比不上匈牙利、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等众所周知的出现民主倒退的国家。同样，还有许多不曾得到传扬的成功案例，或在“棘手地区”幸存下来的民主国家，如罗马尼亚、加纳和蒙古，也是如此。尽管罗马尼亚（它在几十年前还是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贫穷国家）的民主韧性与邻国匈牙利的民主倒退一样令人惊讶，但后者受到的关注要多得多。

总之，在本世纪，民主受到侵蚀的程度是温和的。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着类似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后的逆潮。考虑到许多第三波转型发生在国内条件不利的国家，国际环境不复支持，以及经济波动、国力薄弱、腐败和犯罪暴力已经侵蚀了全球民选政府的公众信任，那么，这么多新兴民主国家的存续确实显示出了惊人的韧性。

民主和准民主政权的惊人持久性根植于两个不同的结构性因素：在某些国家，这种持久性是基于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在另一些国家，这种持久性则较为脆弱，它基于的是威权主义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无能的产物。

现代化与民主的韧性

现代化是许多第三波民主国家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数十年的研究已经证明，经济发展与稳定的民主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关性。¹⁴除了主要的石油生产国外，世界上 53 个高收入国家中有 51 个是民主国家（匈牙利和新加坡是仅有的例外）。

确切地说，经济发展是如何促进民主的？有这么一个学派，以利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以及近年来的罗纳德·英格哈特 (Ronald Inglehart) 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 (Christian Welzel) 为代表，强调教育在培养宽容和自我表达的民主价值方面的作用。¹⁵ 其他学者则认为，通过减少社会不平等，经济的发展要么减少了激进主义和极端化 (这里再一次引自利普塞特的观点)，要么通过减轻再分配的压力和增加资本流动性，为富裕精英降低了民主成本。¹⁶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工业化削弱了反民主的土地所有阶级，并壮大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社会阶级的力量，他们的利益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得到最大程度的促进。¹⁷

我们的方法借鉴了罗伯特·达尔 (Robert A. Dahl) 的研究成果，侧重于社会中权力和资源的分配。¹⁸ 对达尔而言，民主最有可能在“多元社会秩序”中出现并存续，其中财富、收入、技能、地位以及其他关键资源散播于社会中。

资源集中是专制的秘方。当国家垄断主要的财富和收入来源时，公民就依赖政府提供资源——工作、收入、住房、贷款、合同等——这些资源对他们的生计至关重要。政府可以通过拒绝对手和批评者获取必需资源的途径 (同时向效忠者提供有利的获取途径) 来利用这种依赖。

民主需要反对派，而可持续的反对派则需要组织。自治组织必须有获取资源的独立渠道。那些担心失去工作、收入或住房的公民不太可能加入公民组织或反对组织，而那些依存于国家补贴、信贷、合同或许可证的企业也不太可能为这些团体提供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对派组织几乎不可能动员大量人员或建立持久的组织。最终，许多反对派组织被政府收编、局

限于政治边缘，或被逼得走投无路而不复存在。因此，当资源集中在国家手中时，反对派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薄弱、松散，易受收买或不堪一击。

专制的资源集中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中一种形式是经济国家主义。这是一种国家控制生产手段以及主要的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私营部门规模小、依赖性强，使得反对派缺乏财务基础，批评者可能很容易被剥夺谋生手段。¹⁹ 因此，在中国、古巴、朝鲜、越南以及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国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产生了极端的权力不对称，削弱了反对派的生存能力。事实上，根据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的经济自由指数，在 2023 年世界上经济国家主义程度最高的 25 个国家中，只有苏里南和东帝汶是完全民主的。²⁰

分散在乡村地区、缺乏资源和组织的贫困农村人口通常缺乏实现或维持民主所需的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

另一种资源极度集中的形式是石油国家。在石油为基础的租赁经济体 (rentier economies)，例如沙特阿拉伯及相邻的君主制国家，国家拥有大部分财富，形成了类似于指令经济的局面：政府对资源分配的控制

大大提高了公民、企业和民间社会发声和抗议当权者的成本。因此，反对派 (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 的结构基础很薄弱。确实，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 年在石油租金占 GDP 至少十分之一的 21 个国家中，有 20 个是专制国家。圭亚那是唯一的例外。

历史上，威权资源集中的最常见来源是欠发达。在贫困的农业社会中，财产和财富集中在国家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精英手中，而绝大多数公民是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居民，这样的社会对于民主来说基础薄弱。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些条件导致了绝对君主制，或者（如果土地精英能够对皇权产生制衡）立宪寡头统治的出现。分散在乡村地区、缺乏资源和组织的贫困农村多数人口通常缺乏动员的能力，无法实现或维持民主。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力量

这种能力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首先，经济发展带来了更高的个人收入。更高的收入，特别是私人收入，通过增强公民的自主权来赋予他们能量。公民越富裕，越不依赖于国家或恩庇-侍从网络，也就不太可能出卖选票，因此更有能力积极反对政府。他们拥有加入独立组织的时间、技能和资源，并从私人媒体获取信息。更富裕的公民也有助于资助公民和反对派组织，这对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社会财富显著增加了对独立媒体、公民组织和反对派组织的供求。

资本主义发展也催生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私营部门，这个部门不太容易被收买或受到社会经济制裁的影响。新兴的资本主义阶级通常不仅寻求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关键在于，他们拥有维持民主改革运动的资源。²¹ 私营企业往往是政党、独立媒体、公民社会组织和民主运动的重要资金来源。正如丽萨·穆勒 (Lisa Mueller) 所示，21 世纪非洲政治抗议上升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中产阶级的增长，他们有能力为这些运动提供资金支持。²² 但资本家并不总是支持民主。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冷战期间的东亚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他们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尽管如此，一个健康、自主的私营部门是持久民主的必要条件。

经济发展还壮大了先前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一样，并非一成不变地支持民主。²³ 但产业工人阶级的增长，加强了城市贫困群体的集体动员能力，这往往能够把社会权力的分配从寡头或威权政权的精英那里转移出来。事实上，在 20 世纪初的欧洲以及 20 世纪晚期的巴西、波兰、西班牙、南非和韩国，工人阶级的扩张极大地加强了民主运动。²⁴

城市化同样增强了社会的组织能力和集体动员能力。²⁵ 城市居民能够迅速分享信息并建立网络，成为组织化政治行动的基础。²⁶ 此外，城市也使反对派的抗议活动更接近政府的“神经中枢”，从而增加了它们成功的可能性。²⁷ 非暴力的集体动员——即马克·贝辛格 (Mark Beissinger) 所称的“城市革命”——提高了镇压的成本，并且可能超越国家所具备的镇压能力。城市革命并不总是民主化的，但正如贝辛格所示，近几十年来，它对选举民主和公民自由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消极影响。²⁸

最后，教育和识字能力的提高促进了政治动员，因为它增加了公民的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政治知识以及对新思想的接触和实践。事实上，最近的研究显示，教育的扩张与长期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²⁹

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独立的经济和社会权力来源，将资源从国家中分散出去，使领导人更难以垄断政治控制。较高的收入、较富裕的私营部门、较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较大的城市，凡此种种产生了可以称之为抗衡性社会权力 (countervailing societal power) 的力量，这对于实现和维持民主至关重要。通过增强公民独立于国家的组织能力，经济发展为可行的反对派创建了结构基础。

当然，抗衡性社会权力的出现并不能确保民主化，特别是在短期内。经济表现、领导人更替、战争和其他偶发事件塑造了民主转型的可能性。³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化社会秩序和抗衡性社会权力的存在使威权主义变得更难以维持。资金充裕、拥有庞大支持基础的反对派更难以镇压、更难以收买，并且在选举中更具威胁性。社会财富和分散的资源使得威权统治的崩溃更有可能导致民主化，并且使新的民主政体更有可能存活。当资源分散于整个社会而不是集中在国家时，攫取和巩固专制权力就变得困难得多。

国内有利条件的扩散

现代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的韧性，因为与 1970 年代第三次民主浪潮开始时相比，如今的世界要发达得多。半个世纪前，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城市化和教育程度上能让我们期待稳定的民主。即使是如今已工业化的国家，如葡萄牙、南非、韩国和台湾，在 1970 年代初仍以是农村地区为主。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共产主义的中东欧地区，私营部门、独立劳工运动和民间社会都普遍薄弱或不存在，这限制了抗衡性社会权力的发展。这些地区出现的稳定民主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印度、委内瑞拉）是少数例外。

然而，到了 21 世纪初，世界许多地区的国内条件对民主变得更为有利起来。世界变得更加富裕。从 1987 年到 2022 年，被世界银行划入“高收入”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从 25 个增至 53 个（不包括以石油为基础的国家）。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1974 年，全球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如今已有超过一半（5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全球识字率

也大幅提高，通信技术的普及极大地扩展了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强了集体动员的潜力。

这些变化的政治效应是深远的。以韩国为例：1961年，朴正熙将军的军事政变结束了那里的一次短暂民主实验，当时该国贫穷且占绝大多数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规模相对很小，无法维持强大的公民社会。然而，迅猛的工业化改变了这一切。1987年，当学生们起来反对独裁统治时，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强大的工会和一个庞大、繁荣且日益组织完善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领带部队”帮助要求民主的示威活动取得了成功。³¹ 随后，民主政府依靠中产阶级的支持，在1990年代初将军队从政治中清除出去。新政权安然度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今，韩国是世界第12大经济体，并保持着强大的民主。

同样，南非的第一个重要的民主运动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 (ANC) 在1950年代领导的，但在1960年夏普维尔大屠杀 (Sharpeville Massacre) 之后被镇压了下去。当时，南非是一个主要由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黑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规模很小，这使得在近乎一代人的时间里，种族隔离政策没有受到严重挑战。然而，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催生了强大的劳工运动，城市公民社会蓬勃崛起，为大规模抗议活动奠定了基础，使民主化成为可能。³² 如今，南非城市人口占比近70%，人均财富比1970年代增加了四倍多，已经稳定保持民主长达30年。类似的工业化进程也为希腊、西班牙、台湾以及（相对较小程度上）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的民主制度创造了有利的结构条件。

第三波浪潮的其他案例在民主化之后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与西方的广泛

联系。相关的例子包括葡萄牙、智利、墨西哥、巴拿马、波罗的海国家和中欧大部分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罗马尼亚，最初非常贫困，缺乏有效的国家和强健的公民社会，事实上，它们的转型是受到强烈的外部压力推动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西方的紧密联系可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更强大的国家和公民社会。³³ 因此，尽管这些政权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之初所面对的国内条件并不有利，但当时的国际环境为形成更加稳固的民主基础做出了贡献。

富裕的民主国家并非不可能倒退，正如匈牙利、以色列、土耳其甚至美国最近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但富裕的国家民主明显比贫穷国家的更为强劲有力。事实上，自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富裕的民主国家有着完美的生存率。富裕的第三波民主国家表现得非常稳定。截至 2022 年，有 20 个第三波民主国家进入或非常接近高收入群体。包括保加利亚（虽然略低于世界银行的门槛），这些国家计有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巴拿马、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韩国、西班牙、台湾和乌拉圭。其中有 19 个是稳定的民主国家，唯一的例外是匈牙利。

因此，现代化是全球民主韧性的来源。富裕的社会很少出现民主崩溃，而到了 21 世纪初，富裕社会的数量已大幅增加。

专制的脆弱与竞争性政治

经济发展并不足以解释所有第三波民主国家存在的韧性。然而，在结构性条件较差的国家中，许多民主或接近民主的政权——即存在竞争激烈的选

举、定期更替，但并不符合自由民主的所有标准的政权，比如阿尔巴尼亚、贝宁、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马拉维、摩尔多瓦、塞内加尔、乌克兰和赞比亚——在 21 世纪初持续存在。这种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专制的脆弱。

与新兴民主国家一样，大多数新兴的独裁政权都很脆弱。对于一个倾向于威权的政治家来说，在民主国家赢得权力是相对容易的（例如，巴西的博尔索纳罗或美国的特朗普），但巩固独裁政权就要困难得多。在租赁型国家（如安哥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刚果共和国），或政府控制大部分经济的国家（如白俄罗斯、缅甸、土库曼斯坦），又或者非常贫困的国家（如布隆迪、乍得、南苏丹）最容易完成这项任务。独裁政权也可能发生在暴力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如古巴、厄立特里亚、伊朗、卢旺达、越南），它往往会削弱现有的公民社会，产生异常强大的执政党和国家机构。³⁴

然而，屡见不鲜的是，新兴独裁政权缺乏这些条件。事实上，大多数潜在的独裁者继承的都是充斥着腐败、官僚效率低下和财政匮乏的弱国。国家的弱势削弱了独裁统治，限制了政府监控异议、收买或镇压独立媒体、惩罚资助反对派的经济精英以及镇压抗议的能力。在极端情况下，中层或地方官僚可能不肯听命中央政府去操作选举舞弊，而待遇低、装备差的安全部队可能拒绝镇压抗议，甚至加入抗议行动。这种国家的无能，导致了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初格鲁吉亚、海地、吉尔吉斯斯坦和马达加斯加的萌芽中的独裁政权被遏止。

许多新兴独裁政权还缺乏强大的执政党，而这通常对于持久的独裁至关重要。它们组织和协调精英，让他们分享一些权力，确保他们心满意足地留

在政权的阵营中。³⁵ 大多数冷战后的独裁国家会定期举行多党选举，因此党派对于动员、购买或窃取选票也至关重要。由于缺乏强大的政党，现今许多独裁者容易受到精英的背叛和选举失败的威胁。执政党的弱势动摇了新兴威权主义的根基，甚至导致了贝宁、厄瓜多尔、马拉维、摩尔多瓦、尼日利亚、秘鲁、塞内加尔、赞比亚、乌克兰及其他地方有独裁倾向的总统垮台。

这些是“默认的多元主义” (pluralism by default) 案例，即这种情况下，当权者缺乏资源和强制能力来巩固威权统治。³⁶ 在这类案例中，多元化和竞争性政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并非因为有强大的民主制度或民间社会，而是因为政府缺乏基本的组织或行政工具来操纵选举、关闭独立媒体、镇压反对派团体或扑灭示威抗议。

乌克兰就是一个例子。民选的独裁者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不得不在 2014 年的欧洲广场抗议活动中逃离总统职位和国家，部分原因是安全部队分裂并弃他而去。那年早些时候，彼得罗·波罗申科 (Petro Poroshenko) 在没有成立党派的情况下赢得了总统选举。当他在 2018 年试图宣布戒严法以明显试图推迟即将到来的选举时，甚至遭到了他自己盟友的激烈反对。选举照常进行，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波罗申科。威权弱点一直是乌克兰民主的重要来源。

贝宁是另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默认多元主义”案例。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贝宁从 1991 年至 2018 年保持民主体制长达近 30 年。多元主义、竞争性选举和当权者更替的持续存在，原因并不在于反对派的实力，因为反对派分散而又弱小，也不在于有亲民主的领袖。相反，总统尼

塞福尔·索格洛 (Nicéphore Soglo)、马修·克雷库 (Mathieu Kérékou) 和托马斯·博尼·雅伊 (Thomas Boni Yayi) 都缺乏执政党、缺乏对强制机构的有效控制，这使得他们无法让选举战场向自己倾斜 (索格洛)、无法延长任期 (克雷库) 或强行推举自己的继任者 (雅伊)。其结果是，在 1991 年至 2016 年之间，贝宁出现了四次反对派的胜利和当权者的更替。

威权主义难于巩固

在这些“默认多元主义”案例之外，在那些中等收入的弱国，当代巩固威权主义的种种尝试，往往被国家治理中面临的诸多挑战瓦解。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薄弱的国家机构导致了中度到高度的腐败、公共服务的贫乏和分配不均、周期性的财政短缺、社会支出不足，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无处不在的犯罪暴力。这些问题对新兴民主国家构成威胁，同时也困扰着新兴的威权政体。近年来，在阿尔巴尼亚、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北马其顿、马拉维、摩尔多瓦、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斯里兰卡、泰国、乌克兰、赞比亚等地，威权或有威权倾向的总统在公众支持下滑的情况下，要么输掉了选举，要么被迫交出权力，让位给更能民主治国的继任者。换言之，倒行逆施政府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国家向更民主的方向“回滑”。

弱威权政权的权力更迭不应夸大到与民主混为一谈。事实上，它很少能够导致稳定的民主，而是更常与不稳定的、危机四伏的政权相关联 (如阿尔巴尼亚、厄瓜多尔、马拉维、乌克兰、赞比亚)。但是，多元主义、竞争性选举和权力更迭的持续存在绝非小事。至少，它抑制了威权主义的巩固。由于倾向威权的政府无法建立持久的政治资助网络，也无法对诸如司法、

军队和选举机关等机构建立牢固的控制，所以民主力量更有能力抵制威权主义的全面施行。

尽管自由西方的霸权地位已在冷战后消亡，可我们还是生活在历史上最为民主的时期。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多元主义仍在持续甚至在蓬勃发展，而在半个世纪前，多元主义在这些地方还根本不存在。这种韧性植根于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尽管国际环境对民主的亲力度不如从前，但近几十年来，民主的国内条件还是有显著的改善。世界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城市化、教育程度更高，相互的连接更加紧密。从中欧到东欧，从拉丁美洲到东亚以及非洲的许多地区，经济发展已经使政治和经济资源从国家转移到过去被排除在外的群体手中，从而加强了反对运动和民间社会，从而提高了权力滥用需付的代价。此外，许多独裁者缺乏垄断政治控制的资源和组织及强制能力。国力薄弱和地方性社会问题挑战新兴的威权政体，正如它们挑战新兴的民主一样，防止了一些潜在的强人巩固其统治。

明白地说，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全球的民主国家都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实力和俄罗斯的侵略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同样构成威胁的还有西方许多民主国家内部的非自由主义和两极分化上升态势。而且，由于一些我们刚开始醒悟的原因，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中，公众对政治精英和机构的不满、不信任已经急剧上升。³⁷ 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中，一些知名的巩固民主国家，从匈牙利和波兰到巴西、印度、以色列、墨西哥和美国，都开始面临压力。这些发展态势令人深感忧虑。如果美国的民主危机持续或加剧，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然而，为了保护民主，我们必须对它的脆弱性和强大之处都要清楚明白。

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对 21 世纪的民主政体构成挑战，但这些变化也在全世界赋予了民主支持力量更大的能量。尽管在许多地方威权势力依然强大，但在大多数这些地方，威权统治的巩固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财富和城市继续扩张，这些威权的脆弱性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尽管这些并不能保证民主的存活，但它们确实为许多国家的民主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奋发的机会。

注释

- 1 根据民主多样性 (V-Dem) 的数据，从 1975 年到 2000 年，那些在此期间至少拥有 5 年民主的国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在 2022 年仍是民主国家。
- 2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末的民主化》（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瑟瓦·古尼斯基：《余震：20 世纪的大国与国内改革》（Seva Gunitsky, *Aftershocks: Great Powers and Domestic Reform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3 迈克尔·布莱顿和尼古拉斯·沃勒：《非洲的民主实验：比较视角下的政权转变》（Michael Bratton and Nicolas van de Walle, *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Regime Trans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 4 丹尼尔·特雷斯曼：“民主的当前危机有多严重？用历史数据评估风险”，《比较政治研究》（Daniel Treisman, “How Great Is the Current Danger to Democracy? Assessing the Risk with Historical Dat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5 戴雅门：《妖风：拯救民主，抵抗俄罗斯的愤怒、中国的野心和美国的自满》（Larry Diamond,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New York: Penguin, 2019.）
- 6 参见 R. 丹尼尔·科勒曼的文章《欧盟的威权平衡》，发表于《欧洲公共政策杂志》2020 年第 27 卷第 3 期，481-491 页。（R. Daniel Keleman “The European Union’s Authoritarian Equilibrium,”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7, issue 3 (2020): 481-91.）
- 7 斯科特·缅沃凌和塔瑞克·马索德 编著：《恶劣环境中的民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 年）。（Scott Mainwaring and Tarek Masoud, eds., *Democracy in Hard Pla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 8 戴雅门：《民主的倒退：掠夺性国家的复兴》，《外交事务》2009年3-4月期第87卷，36-48页；（Larry Diamond, “The Democratic Rollback: The Resurgence of the Predatory State,” *Foreign Affairs* 87 (March–April 2009): 36–48; 戴雅门：《面对民主衰退》（Diamond, “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6, January 2015: 144, 151.）
- 9 安娜·卢尔曼和斯戴芬·I·林堡：《新一轮威权化浪潮来临：有何新意？》（Anna Lührmann and Staffan I. Lindberg, “A Third Wave of Autocratization Is Here: What Is New About It?” *Democratization* 26 (October 2019): 1095–113.）
- 10 《2023年民主报告：面对威权化的挑战》（“Democracy Report 2023: Defiance in the Face of Autocratization,” V-Dem Institute, www.v-dem.net/documents/29/V-dem_democracyreport2023_lowres.pdf, 9, 6.）
- 11 古尼斯基：《余震》（Gunitsky, *Aftershocks*, 103.）
- 12 安德鲁·T·里图和安妮·孟：《衡量民主的倒退》（Andrew T. Little and Anne Meng, “Measuring Democratic Backslid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即将出版), 3.）
- 13 同上。
- 14 有关统计证据的最新述评，参见丹尼尔·特雷斯曼：《经济发展与民主：倾向与触发因素》（Daniel Treis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redispositions and Trigge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May 2020): 241–57.）
- 15 利普塞特：《民主的一些社会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March 1959]: 69–105;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6 参见卡尔斯·博伊克斯：《民主与再分配》（Carles Boix,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7 本·W·安塞尔和大卫·J·塞缪尔斯：《不平等与民主化：精英竞争法》（Ben W. Ansell and David J. Samuels,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n Elite Competition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迪特里希·吕舍迈耶、伊夫琳·赫伯·斯蒂芬斯和约翰·斯蒂芬斯：《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18 罗伯特·A·达尔：《多元政治：参与与反对》（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76–80.)
- 19 威廉·H·里克尔：《自由主义反对民粹主义》（William H. Riker,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Long Grove, Ill.: Waveland Press, 1982)）；M. 史蒂文·费什，《俄罗斯的民主脱轨》（M. Steven Fish, *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0 参见 www.heritage.org/index。玻利维亚和赞比亚这两个国家可被视为准民主国家。
- 21 安塞尔和塞缪尔斯：《不平等与民主化》（Ansell and Samuels,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zation*）。
- 22 丽莎·穆勒：《当代非洲的政治抗议》（Lisa Mueller, *Political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3 史蒂文·列维茨基和斯科特·缅沃凌：《拉丁美洲的组织劳动与民主》（Steven Levitsky and Scott Mainwaring, “Organized Labor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39 (October 2006): 21–42.)
- 24 迪特里希·吕舍迈耶、伊夫琳·赫伯·斯蒂芬斯和约翰·斯蒂芬斯：《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盖伊·赛德曼：《制造激进：巴西和南非的工人运动，1970-1985》（Gay 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25 马克·R·贝辛格：《革命城市：城市化与叛乱的全球转型》（Mark R. Beissinger, *The Revolutionary City: Urbanization and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Rebell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 26 保罗·斯坦尼兰德：《燃烧的城市：社会动员、国家政策与城市叛乱》（Paul Staniland, “Cities on Fire: Social Mobilization, State Policy, and Urban Insurgen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3 (December 2010): 1628.)
- 27 贝辛格：《革命城市》（Beissinger, *Revolutionary City*, 4, 15.)
- 28 贝辛格，《革命城市》（Beissinger, *Revolutionary City*, 14, 406–11.)
- 29 奥拉西奥·拉雷古伊和约翰·马歇尔：《教育对非巩固民主国家公民和政治参与的影响：来自尼日利亚的证据》（Horacio Larreguy and John Marshall,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Civic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Non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Evidence from Nigeri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99 (July 2017): 387–401.)
- 30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等著：《民主与发展：政治制度与世界福祉，1950–1990》（Adam Przeworski et al.,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特雷斯曼：《经济发展与民主》。
- 31 崔章集：《民主化后的民主：韩国经验》（Jang-Jip Choi, *Democracy After Democratization: The Korean Experience*, 斯坦福：沃尔特·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2012年），第91页。
- 32 赛德曼：《制造激进》（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 33 参见里夏德·拉帕茨基和马柳什·普罗赫尼亚克：《欧盟成员资格与经济增长：中东欧国家的实证证据》（Ryszard Rapacki and Mariusz Prochniak, “EU Membe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EE Countries,” 《欧洲比较经济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6 (Summer 2019): 3–40）。另见托马斯·巴恩贝克·安徒生、米克尔·巴尔斯伦和彼得·范海瑟：《加入繁荣？对欧盟成员资格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Thomas Barnebeck Andersen, Mikkel Barslund and Pieter Vanhuyse, “Join to Prosp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U Membe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Kyklos* 72 (May 2019): 211–38.)
- 34 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坎·A·韦：《革命与独裁：持久专制主义的暴力起源》（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Revolution and Dictatorship: The Violent Origins of Durable Authoritaria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 35 杰森·布朗利：《民主化时代的威权主义》（Jason Brownlee,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6 参见卢坎·A·韦：《默认的多元主义：弱势独裁者与竞争性政治的兴起》（Lucan A. Way, *Pluralism by Default: Weak Autocrats and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 37 参见马修·罗兹·珀迪、瑞秋·纳瓦尔和斯蒂芬·乌蒂奇：《不满时代：当代民主中的民粹主义、极端主义与阴谋论》（Matthew Rhodes-Purdy, Rachel Navarre, and Stephen Utych, *The Age of Discontent: Populism, Extremism, and Conspiracy Theorie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